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

第四卷

高有鹏 著

线装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

第四卷

高有鹏 著

线装书局

目 录

第八章 清明上河图：宋代民间文学的大繁荣	(1089)
一、宋代民间歌谣和谚语	(1094)
二、《突厥语大词典》与《福乐智慧》	(1107)
三、笔记小说与民间传说故事	(1114)
四、宋代的“说话”与民间文学	(1133)
五、宋代民间戏曲	(1146)
六、《路史》的民间文学价值	(1157)
(一)《前纪》的思想特征	(1159)
(二)《后纪》与中国神话传说的文化谱系	(1165)
七、宋代故事传说与社会风俗生活	(1189)
八、传说地图：《太平寰宇记》的民间文学史价值	(1251)
九、历史记忆：《宋史》中的宋代传说故事	(1285)
十、宋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	(1322)
(一)思想的轮廓	(1323)
(二)范仲淹风俗思想	(1350)
(三)欧阳修风俗思想	(1374)
(四)王安石风俗思想	(1404)
(五)司马光风俗思想	(1440)
(六)苏轼风俗思想	(1472)
(七)朱熹的民间文学思想	(1521)

目 录

第八章 清明上河图：宋代民间文学的大繁荣	(1089)
一、宋代民间歌谣和谚语	(1094)
二、《突厥语大词典》与《福乐智慧》	(1107)
三、笔记小说与民间传说故事	(1114)
四、宋代的“说话”与民间文学	(1133)
五、宋代民间戏曲	(1146)
六、《路史》的民间文学价值	(1157)
(一)《前纪》的思想特征	(1159)
(二)《后纪》与中国神话传说的文化谱系	(1165)
七、宋代故事传说与社会风俗生活	(1189)
八、传说地图：《太平寰宇记》的民间文学史价值	(1251)
九、历史记忆：《宋史》中的宋代传说故事	(1285)
十、宋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	(1322)
(一)思想的轮廓	(1323)
(二)范仲淹风俗思想	(1350)
(三)欧阳修风俗思想	(1374)
(四)王安石风俗思想	(1404)
(五)司马光风俗思想	(1440)
(六)苏轼风俗思想	(1472)
(七)朱熹的民间文学思想	(1521)

第八章 清明上河图：宋代民间文学的大繁荣

民间文学穿越过大唐的风烟，走进宋代历史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赵宋王朝整理和吸收唐代文化，重视文治^①，尤其是随着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的迅速发展，戏曲艺术异军突起，整个宋代的民间文学，在艺术形式上几乎具备了所有的类型。宋代（包括西夏、辽、金等不同民族政权的历史阶段在内）民间文学的发展，犹如一幅《清明上河图》，融会了中华民族在这个特殊时代的各种各样的生活。

与唐代社会不同的是，宋王朝的疆域相对狭小，它失去了大唐帝国那样宽阔的胸襟和视野，在它的周围，西有吐蕃，南有大理，东有高丽，北方则有其政治和军事上的劲敌西夏王朝和辽王朝，以及后来崛起的金。赵宋王朝的统治者曾统一中原以及南部和北部的割据政权，但它的扬文抑武的政策，严重限制了它自身的发展，以至于后来出现徽钦二帝被掳，政治和文化重心全面移向东南这样惨痛的局面。尤其是理学的崛起，在对民族思想文化进行规范的同时，也严重限制了民族的创造力。这种种现象的出现，具体影响到宋代民间文学的文化风度。宋王朝曾有过熙宁年间的改革，出现了像王安石那样伟大的改革家，甚至在偏居东南时还曾一度中兴，但它到底还是灭亡了。它的灭亡是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悲哀呢？特别是它对腐败的治理全面无效，个中原因应该引起深思。宋代的法制和吏选制度是相当完备的。在科学技术和文化建设上，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印刷术的发达，民间书院的繁盛，都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如沈括的《梦溪笔谈》，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李诫的《营造法式》，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宋慈的《洗冤录》，以及傅肱的《蟹谱》，韩彦直의《橘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等，都代表着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更不用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乐府诗集》《夷坚志》《资治通鉴》《通志》等文史典册，洋洋数万卷，举世无双；宋代文学大家辈出，如群星闪烁。但是，制度也好，文化也好，都挡不住金兵的铁蹄。作为中国古典文化集大成时代的宋王朝，其灭亡是必然的——使其灭亡的正是宋王朝自身，是其自身思想、文化和

^① 《宋史·文苑传》中有“艺祖革命，首用文臣，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等内容的记述，《宋稗类钞》卷一称，宋太祖曾立戒碑，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也是民间传说故事吧！

体制上的严重缺陷。单纯地发展文化，企图以文化治国、强国，犹如在沙滩上建造大厦，其薄弱的根基无论如何是经不起八方会聚的狂飙的。历史不容许假设，宋代民间文学用最真实而形象的话语，讲述着这个充满耻辱的年代。这个时代的长卷，在审美表现上有着数不清的巧夺天工之举，徽宗等人喜的是天上人间的《大晟乐》，爱的是缘自笔端的花鸟，心里唯独没有千百万劳苦大众。与大唐帝国的豪迈恢宏气象相比，深深地感到怆然。应该说，大宋王朝的统治者们错过了让中华民族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大好时机，令我们惋惜不已。从这种意义上讲，民间文学是这个时代最忠实的记录，一面是风花雪月，一面是“啼天哭地”。民间口述的真实性，是一般史传典籍所不及的。（图4—1）

宋代民间文学有着自己的时代特色。赵宋王朝统一中国，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中国封建专制文化于此时已经走过了最辉煌的历程，渐渐出现了衰败。这是宋王朝的统治者无力回天的大趋势，他们对历史采取了错误态度，其责任是无可推脱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内忧外患，外患在于北方少数民族屡次骚扰入侵，内忧在于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尤其是封建文化自身出现了许多矛盾。世间常说仁者寿，我详细读过《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看到一个尤为突出的生命现象，那就是宋代皇帝命运大多不佳，或者无子，或者短寿，几乎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像宋神宗，可谓历史上难得的一位颇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曾经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的改革商业，元丰年间积累的财帛在徽宗初还没用完，但他年仅三十八岁便撒手而去；宋哲宗继承了他的皇位，结果是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守旧势力卷土重来，“尽废新法”，使改革的成果损失殆尽；正当高太后死去，宋哲宗欲大展宏图时，这位少年天子也是筋疲力尽，二十多岁就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整个宋王朝的历史，总是不能令人扬眉吐气，尽管这个时代的文化成就远远超过了唐代。宋王朝的统治者们太重视文化的发展和控制，过于追求纯正的文化；他们一次次拒绝了少数民族王朝的求亲，失去了联结姻亲使天下安定的重要机会；他们吸取唐代节度使割据称雄的教训，一次次让那些无德无才的宦官充当战争的决策者，使渴望报国的将领们束手无策；在文化建设上，经学笺注趋于没落，佛与道竞相崛起，宋王朝的统治者极力倡导“理”，希望诸种民间文化和宗教信仰能够兼收并蓄，营造出一个以儒学的“三纲五常”理论为核心的精神体系，并到处封神，甚至出现宋徽宗自称道君的荒唐局面。尽管理学的完善是在宋末才出现的，但弥漫在宋王朝精神世界的就是这种儒学、神学相统一的腐朽没落的文化，靠这种装神弄鬼自欺欺人的伎俩，怎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

与此相异的是金的崛起，年青的政治力量的盎然生机。撇开中原王朝唯一合法性社会政治理念，宋、夏、辽（契丹）和金等历史地理版图，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疆域。政治斗争中的此消彼长，都是竞争，而宋王朝在竞争中之所以被动，其实还是思想文化的重要缺失。在我看来，宋王朝的悲剧关键在于这个王朝集体表现出的心胸狭隘，过于急功近利，所以导致它的改革不彻底、不全面。范仲淹、王安石等政治家都倡导改革，但每一次改革都触动了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利



图 4—1

益,阻力重重,只取得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短暂胜利,文化和思想的改革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进展。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极度成熟的同时,也标志着它走到了末路,党争加剧,内讧,政治全面腐败,社会公平正义严重丧失!它对范仲淹他们多次呼喊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的古训常常充耳不闻,所以这个王朝在异族入侵面前就显得格外脆弱。在宋代民间歌谣中,广大百姓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成为一个重要主题,这说明主流文化再也不能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了。当然,有一些歌谣存在着误识,表现了社会文化氛围中所充斥的愚昧、短视等现象。改革的彻底性、全面性、长久性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种道理在宋代民间文学中反复咏唱,应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和思索。民间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某种文化生活的集中反映,宋代民间文学中对改革的迫切呼唤告诉我们,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宋王朝的统治者们更多的是不敢正视现实,他们回避矛盾,甚至沉溺于声色犬马,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民间文学是历史文化的长河,前浪连着后浪;一切都不会风平浪静,都不会无动于衷。

宋代民间文学对唐代有许多继承和发展,而且这种继承不局限于唐代,对唐之前的时代,宋代民间文学也有所继承。如宋人较早提出了“笔记”这一概念(宋祁《笔记》),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宋人笔记 113 种,其中子部小说家类 43 种,子部杂家类 56 种,史部类 14 种。在所谓“杂家”笔记中包含着一些唐及魏晋时代的传说,“史部”笔记中包含得更多。在《太平广记》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几乎保存了唐及唐之前重要民间故事的所有内容。这固然与宋皇室编修《太平广记》的目的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宋代的文化风尚形成了这种保存状况。宋代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图 4—2)其原型、母题有许多都能够在唐代之前的民间文学中找到。最为典型的是民间歌谣和变文,诸如竹枝词在宋代继续存在,并成为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形式,许多民间词曲在宋代进一步完善,出现了宋词的繁荣;变文在宋代初叶真宗时代被禁止,但它却转变成了其他形式,弥漫在其他民间文艺之中。诚如郑振铎所说:“变文的名称虽不存,她的躯壳虽已死去,她虽不能再在寺院里被讲唱,但她却幻身为宝卷,为诸宫调,为鼓词,为弹词,为说经,为说参请,为讲史,为小说,在瓦子里讲唱着,在后来通俗文学的发展上遗留下最重要的痕迹。”^①宋代的民间戏曲更离不开对唐代民间戏曲的继承。如《宋史·乐志》所载:“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享,则用教坊诸部乐。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本隶太常,后稍归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在太平兴国三年,“诏籍军中之善乐者,命曰引龙直”,至淳化四年又改名为“钧容直”,大中祥符五年,“增龟兹部如教坊”。由此可见,宋代宫廷和军队中的音乐机构,对唐代教坊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269页。



图 4—2

有直接继承,那么,民间文学也应当如此。教坊是唐代音乐艺术的重要教育和演出场所,崔令钦在《教坊记》中曾记述“阿叔子”“谈容娘”等女优、调弄之类的内容;南宋绍兴三十一年教坊被遣散罢去,宴享中的演唱由勾栏乐工、百戏杂剧艺人来充当,教坊始让位于新兴的民间文艺。教坊演出对宋代杂剧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宋代民间文学,尤其是戏曲艺术,存在着官民共享的现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许多民间歌舞杂技的演出活动,都是由皇家与民间百姓共同观看的。当然,宋代民间文学的时代特色也是非常明显的,诸如说唱、诸宫调、杂剧、大曲、歌舞等民间艺术,尤其是“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则自南渡”的“永嘉杂剧”(徐渭《南词叙录》)即南戏,都有鲜明的个性。同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诸如维吾尔族的《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其中保存着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蒙古秘史》记述了大量蒙古族历史传说,书末记有“大聚会,鼠儿年七月,写毕于客鲁连河的阔迭额阿敕勒地面的朵罗安孛勒答合和失勒斤扯克之间的行宫”^①,由此可知,虽然这部巨著的汉文音译本在明代才出现,但其成书于1240年间,相当于南宋第一部法医著作《洗冤录》问世前后,在《数学九章》问世之前。民间文学作为社会风俗生活的重要形式,在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的风浪中前行,常常汹涌澎湃。

更重要的是,继汉代之后,宋朝,尤其是北宋时期,形成民间文学思想理论的又一次高峰。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他们,表现出对民间文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风俗生活的热忱,形成他们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学思想体系。这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内容。

宋代民间文学是我国民间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它记录了宋王朝319年间的风风雨雨及其所形成的繁荣景象,令我们深思。

一、宋代民间歌谣和谚语

宋代民间歌谣主要保存在《宋史》《宋季三朝政要》《宣和遗事》《宋名臣言行录》《东都史略》等史籍和一些笔记之中,其中时政歌谣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时政歌谣最鲜明的主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辛辣讽刺与深刻批判,一是对正义力量的维护和赞颂。

对邪恶现象的指斥表现出民间百姓清醒的认识,包含着他们对黑暗势力的憎恨、轻蔑。如《宋史·李稷传》中记李稷“擢盐铁判官”,“遂为陕西转运使,制置解盐。秦民作舍道旁者,创使纳侵街钱,一路扰怨,与李察皆以苛暴著称”,“时人语曰:宁逢黑杀,莫逢稷察”。《宋史·崔鷟传》中载,“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鷟上书曰:‘今宰相章惇狙诈凶险,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贼。贵极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为贼,岂非以其孤负主恩,玩窃国柄,忠臣痛愤,义士不服,故贼而名之,指其实而号之以贼邪!京师语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谓惇与御史中丞安惇也。’”(《东都事略·儒学传》亦载此)《宋史·苏绅传》载,

^① 谢再善译本《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6年版。

“绅与梁适同在两禁，人以为险诋。故语曰：草头木脚，陷入倒卓”。《宋史·秦桧传》记述秦桧阴险残忍，报复忠正之臣，贬至“地恶瘴深”的安远县，谚语称“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被贬者必死。《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载：“理宗绍定三年，上饮宴过度，史弥远卧病中书，时人讥之曰：阴阳眠燮理，天地醉经纶。”《舆地纪胜》卷三十二“江南西路”载，“宣和末，金敌入寇”，赣州李大有“守虔州”，他进行“召募，不旬日得五千人，鼓行而前”，于是“淮甸歌曰”：“天下奸臣皆守室，虔州太守独勤王。”卖官鬻爵，横征暴敛，是社会黑暗的集中表现。《曲洧旧闻》卷十载：“王将明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故当时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载：“方腊破钱塘时，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带者数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朱勔是著名奸臣，败坏朝政。所以“时谚”曰：“金腰带，银腰带，（图4—3）赵家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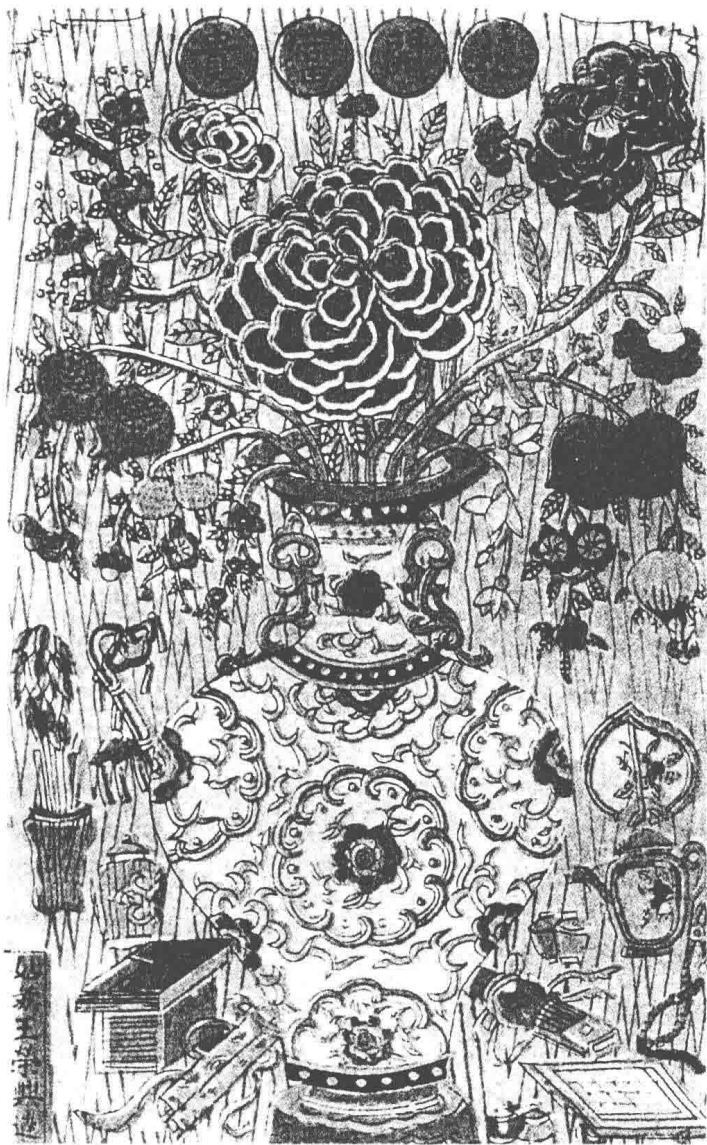


图 4—3

朱家坏。”《老学庵笔记》卷二载：“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得（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老学庵笔记》卷六载：“及大驾幸临安，丧乱之后，士大夫亡失告身批书者多。又军赏百倍平时，贿赂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吏辈为之语曰：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齏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身饿鬼。”《鸡肋编》中“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载有“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是受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发酒醋”（《张氏可书》卷一载：绍兴间，盗贼充斥，凡招致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为生）等歌谣。社会黑暗腐朽之至，宋代出现的这种状况，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故《四朝闻见录》“戊集”所载歌谣大声疾呼：“满朝（朝）都是贼！”

的确，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因为他为了他人更好的活着；有的人活着，却被人诅咒，诅咒他不如死了，因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好过！历史上的坏东西，被人诅咒，常常是有权有势的家伙，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下场一般都没有好的。在民间传说故事中，这些坏东西被神仙所报应；在现实生活中，其无一例外受到人民唾弃。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世世代代如此。宋代的民间歌谣批判现实，代表着时代的良心，是历史的又一次重复证明。或者说，如果这些历史的垃圾、民族的罪人、社会的败类没有被鞭挞，民间文学就已经不存在！

民间文学是历史的良心。

民间时政歌谣对社会黑暗力量的仇恨，常常集中在对一些祸国殃民的奸佞的诅咒上，以此表达胸中的愤懑。如《独醒杂志》卷九载：

何执中居相位时，京师童谣曰：

杀了種（童）蒿割了菜（蔡），

吃了羔（高）儿荷（何）叶在。（图4—4）

说者谓指童贯、蔡京、高俅三人及执中也。

《清波别志》卷上载有同样内容：“蔡京、童贯，朋奸误国，时有谣语：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续通鉴纲目》卷十三中记述了“大蔡、小蔡，破坏天下；大惇、小惇，殃及子孙”，对蔡京、蔡卞、章惇、安惇等“误国欺君”之流进行了无情鞭挞（《夷坚志》《宋史》亦载此歌谣）。

《宣和遗事》记述的歌谣中对这些奸臣的诅咒更加严厉：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用丞相章惇言，举蔡京为翰林学士。满朝上下皆喜谀佞，阿附权势，无人敢言其非。



图 4—4

殿中侍御史龔夬上表奏言：“臣伏闻蔡卞落职，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圣断。然臣窃见卞、京表里相济，天下知其恶，民谣有云：

二蔡一惇，
必定沙门，
籍没家财，
禁锢子孙。
又童谣云：
大惇、小惇，
入地无门。
大蔡、小蔡，
还他命债。

百姓受苦，出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为人反复变诈，欺陷忠良，皆由京、卞二人簸弄。”

是时，章惇罢相，贬雷州居住。

蔡京成为宋代民间文学中一个狡诈、阴险、残忍、狠毒的典型，一切罪恶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民间文学正是通过这个典型来概括全社会的黑暗。姑且不论历史上真正的蔡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到全社会复杂矛盾的交织；在蔡京身上，汇聚着数不尽的仇恨。不独这些史籍，在其他一些笔记诸如《太清楼侍宴记》《避戎夜话》中，也记述了“蔡京居中人不羨，万乘官家渠底串”，“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山东，却管陈东。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等歌谣。在这里，没有必要为蔡京辩护，证明他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很有学识、很有能力的干臣，证明他曾经蒙冤，是民间歌谣如何对他不公平；可以理解的是，民间百姓恨透了黑暗，而蔡京、童贯、朱勔、高俅、何执中、章惇之流，在历史上确曾制造了数不胜数的黑暗，他们是一层遮天蔽日的乌云，所以，他们成为民间文学诅咒的对象是理所当然的。这里面固然有毛泽东批评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倾向，更重要的是民间文学表达了人民的情感，在理解它的真实时不必拘泥于历史，更何况历史在文献中有许多内容并不真实！

《宋诗纪事》中记述了一些无能将帅的丑态，如其卷九六中的《嘲张师雄》：

昨夜阴山贼吼风，
帐中惊起蜜翁翁。
平明不待全师生，
连著皮裘入土空。

其卷一百《行在军中谣》载：

张家寨里没来由，
使它花腿抬石头。
二圣犹自救不得，
行在盖起太平楼。

前一首讲述的是张师雄“好以甘言悦人”，“洛中人目为蜜翁翁”，其“会官于塞外，一夕，传胡骑犯边，师雄仓皇震恐，衣皮裘两重，伏于土穴中”（《宋诗纪事》引《隐居诗话》）。后一首讲述的是“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少壮长大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号花腿，军人皆怨之”，“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搬运花石，皆役军兵”（《鸡肋编》），所以兵卒们唱此歌谣讽刺之。由此可见宋王朝军事腐败的普遍性。

《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中记述了“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无粮同饿，得肉均分”的歌谣，还有《宣和遗事》中记述的“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则反映了著名的水浒英雄与朝廷官军的殊死斗争，（图4—5）歌颂了人民对黑暗势力的反抗。



图 4—5

民间歌谣对寇准、包拯、范仲淹、岳飞等历史上的英雄，给予了深情的讴歌与赞颂，其中包含着民间百姓的向往和呼唤，是他们渴望光明、期待社会安定和国家富强的的心声。在这些英雄们身上，会聚着民族的爱戴和希望，他们的无私、刚正、为人民谋福利等光辉品格被尽情地宣扬，在民间文学中被塑造成济世救人、光明磊落的典型。如《宋史·岳飞传》中所记，岳飞“师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猝遇敌不动。故敌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范仲淹

字希文，是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志士，“明敏通照，决事如神”，《东都事略·范仲淹传》中记述“京师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其知延州时，“训练齐整”，“与韩琦俱有威名”，《东都事略·范仲淹传》载军中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寇准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宰相，丁谓曾陷害他，《东都事略·寇准传》中载民间歌谣：“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宋名臣言行录》中称他“性忠朴，喜直言，无顾避”，载有“寇准上殿，百僚股栗”的歌谣。包拯是民间百姓崇敬的“清官”，《宋史·包拯传》载，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所以，歌谣中称赞他的威严：“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其他还有《舆地纪胜》卷九八所载的“君不见恩平陈守贤，优游治郡如烹鲜”，这是对“守南恩州”的陈丰“田野无秋毫之扰”的赞颂；其卷一八七所载“日出而耕，日入而归。吏不到门，夜不掩扉。有孩有童，愿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孙薛儿”，是对巴州刺史薛逢的赞颂；其卷一八一中载“我有父母，前吕后王。抚爱我民，千里安康”的歌谣，是对蓬州官吏吕锡山、王大辩“相继为守”政绩的赞颂。《过庭录》中记述范纯仁“门下多食客”，他“以己俸作布衾数十幅待寒士”，民间歌谣称“孟尝有三千珠履客，范公有三千布被客”。这虽然有讥讽之意，但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到范纯仁之“仁”。这些歌谣表明，正是因为范仲淹、包拯、寇准、岳飞等贤臣名将的尽职尽责，才缓和了社会矛盾，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体现出民族的浩然正气。（图4—6）正因为如此，宋王朝才持续了三百多年而没有很快灭亡。

但是，民间文学有时也会出现为传统的主流话语所支配的现象，宋代时政歌谣中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就表现出宋代文学的严重缺憾。王安石变法是宋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大事。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希望以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宏伟理想；但是，他面对的不仅是诸如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一代具有保守意识的政治家，而且是千百年来积累而成的传统的腐朽力量，同时还有吕惠卿之流的险恶之徒；特别是他触动了皇室曹太后、高太后等人和为富不仁的巨商大贾这些传统政治中既得利益者，所以，面临着儿子王雱的早逝、吕惠卿的背叛，他势单力薄，终于失败了。王安石无私无畏地推行变法，他应该被视作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可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北宋末年的邵伯温之流卑鄙文人，用无耻谰言攻击、中伤王安石，这对宋代民间文学中王安石形象被扭曲有着直接联系。元代学者就有人想把他归入奸臣之列，但是找不出他利己的蛛丝马迹，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无私。他没有家产，没有墓碑，只有一腔热血；而至今还有一些心胸狭隘的学者对他不理解，甚至无视其贡献，横加非议。在宋代历史文献中，就有不少人把社会的混乱、丑恶，归之于他的改革。如《老学庵笔记》卷六中称“自元丰官制，尚书省复二十四曹，繁简绝异”，记述京师歌谣道：“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被裤；刑都比门，总是